清史研究前沿·八旗制度探赜

清代蒙古八旗口外游牧地考

哈斯巴根

[摘要] 入清后，喀喇沁蒙古黄金家族及部分乌梁海塔布囊们先编入满洲八旗。天聪九年设蒙古八旗后，又转入蒙古八旗。当时，这些喀喇沁和部分乌梁海人驻牧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多伦县及其附近的口外游牧地（nuktere ba）。档案资料显示，从清初到晚清蒙古八旗各旗牛录所属喀喇沁、浩齐特、扎鲁特等各部不少蒙古人丁一直驻牧在口外游牧地。另外一些属于满洲旗、汉军旗以及牧群、王公等私属人丁也长期驻牧在口外游牧地。有清一代，在京蒙古八旗和游牧地蒙古八旗之间人员是可以互相流动的。

[关键词] 清代 蒙古八旗 游牧地 察哈尔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1）－03－0024－0013

清入关以后，八旗首先被安置在北京内城中，各旗都有固定的住址。随后因设立全国各地的驻防点，八旗满、蒙、汉各旗人户也安排到内地各处驻防。[①] 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具体到蒙古八旗，其驻防地都在以上提到的北京和内地吗？清代官方所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八旗志书，对蒙古八旗驻地问题的记述语焉不详。近期，笔者通过解读满、蒙、汉文档案文献，了解到蒙古八旗在口外的游牧地情况。

一、明末清初喀喇沁黄金家族的游牧地

天聪九年（1635），在“在内喀喇沁”和“旧蒙古”的基础上，增编当年新编审的喀喇沁蒙古而成立了蒙古八旗。[②] 虽然因没有确切的数据记录，我们尚无从知道喀喇沁人在整个蒙古八旗所占比例，但通过考察《八旗通志初集》等后期编纂的官书，可以了解到喀喇沁佐领在整个蒙古八旗中占有半数左右比例。这就说明通过考察蒙古八旗所属喀喇沁部众的驻地，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蒙古八旗的驻防地情况。因此，我们首先考察编入蒙古八旗的喀喇沁黄金家族驻牧

[收稿日期] 2020-12-10
[作者简介] 哈斯巴根（1972－），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hsbgn@126. 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多语种档案文献与清代八旗蒙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20VJXG010。

① 相关研究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② 相关研究主要有阿南惟敬：《天聪九年蒙古八旗的成立》，阿南惟敬：《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局，1980 年；郭成康：《清初蒙古八旗考释》，《民族研究》1986 年第 3 期。

地问题。

对蒙古喀喇沁万户的起源、形成以及“诺颜－塔布囊”体系的发展与后金国的关系，乌云毕力格有过系统的探讨。他结合明朝汉文文献和蒙古文文献指出，喀喇沁万户第一代汗巴雅斯哈勒昆都伦（1510–1570）有五子，长子黄把都儿，次子青把都儿，三子来三兀儿，四子满五素，五子马五大。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卒后，黄把都儿长子白洪大即喀喇沁万户汗位。当时喀喇沁万户的牧地大概在宣府边外，在旧开平、张家口互市。①

17 世纪初成书的《万历武功录》对喀喇沁万户牧地的记载比较具体，指出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逐插汉根脑及大沙窝、三间房水草，旁近三卫。常以精兵三万，政自强大也”。② 乌云毕力格认为，插汉根脑是插汉脑儿之误。③ 三间房也称插汉根儿。大沙窝即内蒙古中部浑善达克沙漠。④ 再考虑到当时蒙古游牧社会状态，可以推测他们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死后，次子“所居在大沙窝、三间房，旁近赤城”，四子“所居在小白阳堡边外”，五子“所居在大沙窝、三间房也”。⑤ 可见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诸子游牧地大致上和他们父亲时代没有多大变化，这也符合当时蒙古的分封制等社会政治习惯。

乾隆中期纂修的《口北三厅志》卷七“蕃卫”记述清代察哈尔八旗及其相邻的苏尼特、阿霸哈纳尔等扎萨克旗的地理位置。“蕃卫”附有“前代部落”，言：“刘孔胤《宣镇图说》，成于万历季年，最为详尽。”⑥ 但我们很难见到流传至今的《宣镇图说》，所以在此转引《口北三厅志》中的《宣镇图说》内容。该书言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之长孙白洪大故，其长子打利承袭，“亦部中王子，统属节流枝派三十余枝，共约部夷数十万有余，强弱相半，俱在独石口边外，地名旧开平等处驻牧，离边二三百里不等。其马营赤城边外，地名补喇素泰，为汪阿儿害驻牧”。以上是上北路。接着该书交待宣镇中路边外，“独石口外地名贾阿苏泰，新称鞑靼王子打利台吉等驻牧。共约部夷一万余骑，离边四百余里。……卜罗它害我者台吉等驻牧旧开平城，共约部夷二千余骑，离边三百余里。……满五素男喇布台吉等驻牧桓州驿，共约部夷一千余骑，离边二百余里。……白言台吉驻牧搜记朵言，约部夷一万余骑，离边三百五十里。……满五素男不喇兔台吉驻牧屹塔素，约部夷四千余骑，离边四百余里。……满素男本不失等驻牧卜罗计，共约部夷三千余骑，离边五百余里。马营堡口外地双山儿，白言台吉下部落驻牧，离边二十余里。……赤城堡边外地名汪阿儿亥，解生黄台吉下妥脱儿倘不浪等驻牧，并部落八百余骑，离边二百余里”。“中路边外系白洪大等下拨来散夷守口，离边十余里。其酋首白洪大在独石口边外旧开平等处驻牧，有二万余骑，离边二百余里。”“上西路，张家口堡外寺儿沟，离边二十里，青把都台吉前来互市驻牧于此。”⑦ 可见一直到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曾孙打利一代，喀喇沁黄金家族主体部分依然驻牧在独石口边外，而张家口、宣府是他们和明朝互市的地点。

“补剌素泰”，可能是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记，在镶黄等四旗牧厂西南四十里有布林泉，又其西南十里有布尔哈苏台泉，就是正白旗察哈尔驻地。⑧“开平城”“桓州”，《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部分“中书省”图标的很清楚。⑨ “开平城”即开平府，是元代的陪都，也是元代政治中心

①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2–33 页。

②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9，中华书局，1962 年。

③ 乌云毕力格：《喀喇沁万户研究》，第 34 页。

④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87 页。

⑤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9。

⑥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 7，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117 页。

⑦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 7，第 119–120 页。

⑧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 548，《四部丛刊续编》本。

⑨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7 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7–8 页。

之一。嘉庆重修《一统志》“牧厂”古迹部分有“桓州旧城”和“开平旧城”。[①]“赤城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北京城图》长城独石口以南地方用红色小方块表示其所在赤城县城。[②]

汉文《宣镇图说》的主要价值在于交待了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期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的后裔第三、四代喀喇沁黄金家族的游牧地。他们以白洪大子打利为首，其部众有数十万余，主要散居在从赤城、独石口边外十余里开始，以旧元上都、桓州为中心，到浑善达克沙漠的广大区域。

有关明末喀喇沁黄金家族的牧地，蒙古文《俺答汗传》提到三世达赖喇嘛时说，“鼠年（1588），在喀喇沁的ǰiγasutai地方圆寂”。[③]乌云毕力格利用《蓟镇边防》《武备志》《北虏世代》等汉文文献和蒙藏方面的史料进行研究后指出，“边外的旧开平为喀喇沁万户首领白洪大的驻牧地”，“今天的（内蒙古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的扎格斯台淖尔一带就是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地”。[④]实际上，有关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ǰiγasutai，在《口北三厅志》中已有明确的记载：“正蓝旗在独石口东北三百六十里，总管驻扎哈苏台泊。”[⑤]这符合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的嫡长孙白洪大和次子青把都儿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他们的领地的境况。说明白洪大他们的牧地在扎哈苏台泊周围。另外，罗桑丹津的《黄金史纲》称阿拜诺颜之墓在伊麻图地方。[⑥]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根据《蒙古游牧记》认定，伊麻图是清代东土默特旗西南三十里、喀喇沁右旗南一百三十五里处的蟠羊山。[⑦]阿拜诺颜是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三子萨赖之子。又《口北三厅志》“蕃卫志”载：“（察哈尔八旗的）镶白旗在独石口北二百四十五里，总管驻布雅阿海苏默，东至太仆寺牧厂界八里。”[⑧]布雅阿海即布颜阿海，是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第五子之子。这些后期的资料进一步佐证了明末北元喀喇沁黄金家族的牧地在独石口边外的事实。

史载，后金和蒙古喀喇沁部缔结军事联盟后不久，于天聪三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后金兵征伐明朝华北地区。当年十月，以喀喇沁部落阿拜诺颜之子台吉布尔噶图为进兵向导，当时清军次第路过苏布第塔、喀喇沁喀喇城、喀喇沁上都河、喀喇沁察罕和洛等地。[⑨]这些地名信息也说明喀喇沁塔布囊苏布第在内的喀喇沁台吉和塔布囊们在明末清初都居住在上都河流域。

从以上诸头目的牧地可以了解，在察哈尔林丹汗西征之前，喀喇沁万户的首领阶层驻牧在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正蓝旗、多伦县一带滦河上游上都河流域。而天启七年（1627）十月林丹汗的西征是从攻打布颜阿海、喀喇沁诸部开始的。[⑩]

据史料记述，天聪五年正月时，打利（即汗阿海绰斯奇卜）之子拉思喀布汗、阿拜诺颜之子布尔噶图分别与镶黄旗旗主阿巴泰、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两个家族结成姻亲关系。所以日本学者梅山直也推测说当时拉思喀布、布尔噶图分别编入其姻亲所属满洲八旗各旗分。[⑪]但是，根据《满文老档》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条所述，拉思喀布属于正黄旗蒙古人，布尔噶图属于正

---

①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548。

②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③ 《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5页。

④ 《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之地望》，乌云毕力格：《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⑤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7，第111页。

⑥ 罗密：《博尔吉济特氏族谱》，乌兰巴托影印本，2011年，第758页。

⑦ 罗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蒙古文），纳古单夫、阿尔达扎布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据说清初著名的阿兴喇嘛或称喀喇沁的额齐格喇嘛在一段时间内也在伊麻图地方修行，齐克奇编译：《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库伦旗志办公室编：《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34–135页。

⑧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7，第111页。

⑨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一，东洋文库，1959年，第235–237页。

⑩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295页。

⑪ 梅山直也：《八旗蒙古的成立与清朝的蒙古支配——以喀喇沁蒙古为中心》，《社会文化史学》48，2006年。

蓝旗蒙古人。[①] 当然拉思喀布改旗的原因与天聪九年正蓝旗解体事件有关。然而，天聪五年三月，和拉思喀布、布尔噶图一同归附后金的布颜阿海之子弼喇什，当时娶镶红旗旗主岳托之女，加入镶红旗，他所属旗色一直未变。所以，罗密（和布尔噶图同属正蓝蒙古旗）《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所述拉思喀布汗编入蒙古正黄旗，弼喇什编入蒙古镶红旗，[②] 以及布尔噶图在蒙古正蓝旗，均为罗密时代的事情。

查阅《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内容，其未明载喀喇沁黄金家族成员所属佐领的情况，但乾隆年间所修《钦定八旗通志》的“谨案”部分记录了拉思喀布佐领的情况，说正黄蒙古旗都统喀喇沁参领所属第三佐领：“此佐领从喀喇沁贝勒拉思哈布额驸带来蒙古人等编为勋旧佐领，至拉思哈布之孙巴朗无嗣，于雍正年间改为公中佐领。”镶红蒙古旗都统第一参领所属第六佐领，“此佐领原系多罗额驸必拉喜率属来归编立佐领。”[③] 拉思哈布额驸就是拉思喀布汗，而必拉喜就是弼喇什额驸。布尔噶图家族历代所袭佐领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八旗世袭谱档中有所了解。喀喇沁执政诺颜布尔噶图率领男丁四百八十八名来归皇太极后，组编三个佐领。康熙十一年（1672），因人丁繁衍，又增编三个佐领。[④] 可见，投诚后金时在喀喇沁黄金家族当中布尔噶图的势力最强。

那么，编入蒙古八旗各旗分的，以拉思喀布、弼喇什、布尔噶图等为代表的喀喇沁黄金家族的驻地在哪里？是和大部分蒙古八旗同驻在京城还是驻于内地的驻防点？清代官修文献都没有明确的信息。以前学界一般认为，在入关前满洲八旗中的蒙古佐领和蒙古八旗各佐领都和其他八旗一同居住在盛京及其附近地区。梅山直也认为，天聪五年三月以前，喀喇沁黄金家族的佐领已经编成。所以到天聪九年设蒙古八旗时，他们就成为“在内旧喀喇沁”了。内喀喇沁部分“新旧”都不驻在盛京，天聪九年二月以前一直在游牧地。[⑤] 最近，梅山直也主要利用崇德五年（1640）“审查蒙古八旗倒毙马匹数目”档案，[⑥] 指出当时蒙古八旗所属佐领分为“盛京地方”佐领和“喀喇沁游牧地方”佐领。其中盛京佐领是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陆续归附的蒙古，居住在当时的都城盛京；游牧地方佐领是由游牧地生活的喀喇沁人构成。但是，他没有讨论编入蒙古八旗的喀喇沁黄金家族具体的游牧地到底在哪里的问题。梅山直也根据《满文老档》[⑦] 等认为，布尔噶图在天聪四年时居住在罗文峪、潘家口一带。[⑧]“罗文峪”，就是罗文峪口，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彩绘《北京城图》所绘长城图上标得很清楚。[⑨]“潘家口”，《口北三厅志》所附《口北三厅全图》标得也很清楚，位置在离长城喜峰口以西不远的地方。罗文峪和潘家口应该是布尔噶图此次参与后金与明朝之战的临时驻防点，而不是他较长期的驻牧地。当然此地应该与他原独石口外的驻地相距不远。

此外，研究显示，八旗所属喀喇沁人与扎萨克旗喀喇沁人一同参加从天聪至崇德年间对明的历次战争。梅山直也认为，清朝采取通过编入八旗的喀喇沁黄金家族来支配乌梁海氏喀喇沁塔布囊家族的策略。[⑩] 这是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清世祖实录》载，崇德八年皇太极死后，各处蒙古首领或亲自或派使者前来盛京进香。崇

---

①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四，第1388页。

② 罗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

③《八旗通志初集》卷11、12，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钦定八旗通志》卷18、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④《满文八旗世袭谱档》第14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

⑤ 梅山直也：《八旗蒙古的成立与清朝的蒙古支配——以喀喇沁蒙古为中心》。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138–139页。

⑦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一，第296、307页。

⑧ 梅山直也：《八旗蒙古的成立与清朝的蒙古支配——以喀喇沁蒙古为中心》。

⑨《北京城图》，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第3页。

⑩ 梅山直也：《八旗蒙古的成立与清朝的蒙古支配——以喀喇沁蒙古为中心》。

德八年八月，“附八旗下外藩驻牧蒙古公博洛、多罗额驸戴达尔汉、昂邦章京阿尔鼐、古墨德、祁他特车尔贝、查木素、诺尔布、德参济王、卓尔齐泰、哈岱、叟格毛海、梅勒章京绰尔门衮楚克、甲喇章京海塞、穆章等上大行皇帝香，献鞍马，银器等物，酌纳之。”① 其中，可以考证祁他特车尔贝、德参济王等人都属于游牧察哈尔八旗，因此可以推测当时喀喇沁黄金家族多罗额驸戴达尔汉布尔噶图等人的游牧地与察哈尔八旗游牧地相邻。

当年十月，“喀喇沁部落额驸弼喇席下阿布图等进香，献蟒衣、缎、马等，酌纳之。”② 此事在《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有更确切的记载，其有“bayan sübe 地方的喀喇沁弼喇什额驸下的阿布图进香”等内容。③ 我们知道“bayan sübe”是宣府的蒙古语地名。据内国史院档载，崇德三年七月，“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希、喇西希布等往明张家口，与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兼议开关贸易事”。④ 喇西希布是拉思喀布的另一种音写方式，毕喇希就是弼喇什额驸。可见，在清初不管是喀喇沁的台吉还是塔布囊们都在明清之间当中介，或更准确地说，从 1628 年开始到入关前一段时间内他们代表清朝，与明朝在张家口（宣府附近）等长城关口做边境贸易，以人参、貂皮等换回清朝短缺的粮食、纺织品等物资。

可以说从天聪初年开始到崇德八年入关前，喀喇沁部博尔济吉特氏黄金家族成员长期居住在宣府边外，极有可能就是居住他们在独石口边外的原游牧地。

天聪元年，察哈尔林丹汗率部西迁时，首当其冲的是喀喇沁万户，当时喀喇沁黄金家族四处逃散。我们知道有些喀喇沁台吉后来编入喀喇沁扎萨克旗，⑤ 而其逃散后喀喇沁的部分成员远迁至当时外喀尔喀的东部地区，直至清末居住在外蒙古车臣汗部。2018 年，蒙古国国立图书馆公布了该馆藏的文献目录及一些影印件图像，其中就有一份传统蒙古文撰写的清代喀喇沁黄金家族家谱，其内容虽简单，但贵在罗列出了达延汗之后共 16 代人的世系。其前几代的世系是，达延汗之子巴尔思博罗特，其子昆都伦汗，其子白浑岱汗，其子绰思奇布汗，其子 lašiγba qan，其子诺尔布，其子巴楞，其子巴拜，其子顾穆，其子垂扎木素，其子弼什勒图，其子章楚布等。家谱末端有盟长之印和日期，据此可知家谱形成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⑥ 我们根据清初蒙古文文献知道绰思奇布汗之子名为 laskib qan, 而并不是以上家谱所述 lašiγba qan。这可能是因时间长久，后人编纂家谱时出现的小错讹，而家谱提供的其他信息是准确可靠的。如罗氏《黄金史纲》所言拉思喀布子诺尔布胡鲁穆希及其子巴楞，父子两人的身影始终不见于传世文献，而见到本家谱后可以得知，他们很早就亡命至外喀尔喀车臣汗部去了。

天聪八年十月，举行硕翁科尔会盟，给蒙古诸部指定牧地，对此日本学者冈洋树等多位学者做过研究，最近梅山直也参与了探讨。⑦ 他发现参与此次会盟的人当中，代表两红旗的吴巴里散金是当初喀喇沁和后金订立盟约时派去的使者。后来他引导弼喇什等人归附后金。据史料载，此次分划牧地的目的是指定新编入八旗的蒙古与其他蒙古之间的牧地边界。可以推测，当时一段时间内这些临时编入满洲八旗的蒙古诸部包括弼喇什等喀喇沁黄金家族诺颜、台吉们都游牧在原游牧地以东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南地区。但从后来的形势看，因天聪九年察哈尔的主体部

---

① 《清世祖实录》卷 1，崇德八年八月乙酉。

② 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乾隆本康熙本比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647 页。

③ 李保文编：《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年，第 324−327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第 328 页。

⑤ 《署理理藩院尚书明安达礼等题报审理巴拜控告喀喇沁部万丹塔布囊占有其家奴情形本》，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 1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5−48 页。

⑥ ündüsün−ü bičig soyol un öb,ulaγanbaγatur，2018on，134 duγar qaγudasu.

⑦ 梅山直也：《八旗蒙古的成立与清朝的蒙古支配——以喀喇沁蒙古为中心》。

分都归附后金，包括喀喇沁黄金家族在内的部分蒙古八旗人户应该很快就返回到其上都河流域的原牧地。

概括而言，从 16 世纪晚期到 17 世纪 20 年代，喀喇沁万户的黄金家族头目们一直驻牧在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正蓝旗和多伦县附近上都河流域。1627 年遭到林丹汗的军事冲击后，他们及其绝大部分属民临时离开其驻牧地，避难到明朝长城以内，但他们很快和后金满洲缔结了军事联盟，到天聪五年时其大部分人众已经编入满洲八旗，剩下的有些台吉被编入喀喇沁扎萨克旗，还有一些台吉逃到外喀尔喀车臣汗部。

虽然文献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结合零星的档案资料可以推测，从天聪年间到顺治初入关之前，以拉思喀布、弼喇什、布尔噶图为代表的喀喇沁黄金家族的成员们长期驻牧在今天的正蓝旗、多伦县及其附近地区。包括察哈尔八旗以及蒙古八旗所属喀喇沁黄金家族在内，在清朝方面的文献中被称为“附八旗下外藩驻牧蒙古”。他们与内地八旗驻防不同，都在长城张家口、独石口等口外游牧地生活和驻防。当然，这些喀喇沁人直接统属于在内京旗各蒙古八旗，而和察哈尔八旗没有从属关系，只是他们和察哈尔八旗同驻在口外游牧地而已。

二、口外驻牧的蒙古八旗所属部众

在前节我们考察了口外游牧地居住的喀喇沁博尔济吉特氏黄金家族成员，已知清初属于在京各旗都统所管蒙古八旗的部分人户在入关前长期驻牧在口外游牧地。以上是初步的认识。笔者继续查阅一些档案资料后发现，在游牧地居住的蒙古八旗人户不仅仅是喀喇沁黄金家族成员，还有一些从属于蒙古八旗的蒙古各部人户也居住在口外游牧地。首先看东洋文库所藏满文《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所述。

镶白旗蒙古都统右参领所属第十佐领，此佐领原为喀喇沁部鄂齐尔乌巴什塔布囊所率来二百丁（haha），编立牛录后滋生人丁增编牛录，令鄂齐尔乌巴什塔布囊亲弟子孙承袭。[①] 再据该家族世系表，鄂齐尔乌巴什塔布囊的父亲是诺木图，其祖父叫巴颜达里。巴颜达里还有一个儿子叫布雅赖，布雅赖的儿子是阿彦。阿彦的曾孙毛伦泰居住在游牧地（nuktere ba）。[②] 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喀喇沁鄂齐尔乌巴什家族一些分支仍居住在游牧地。[③] 可见不仅有喀喇沁黄金家族，喀喇沁塔布囊家族的一些人员一直到 19 世纪初仍居住在游牧地。这里所说“游牧地”只能是长城边外，应该与喀喇沁台吉们的牧地不远。

另外，还有一些原从属海西女真的蒙古人也驻牧在游牧地。天命四年（1619）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叶赫部，掳掠其克音特城外所居游牧蒙古（nuktere monggo）的牛马羊。[④] 这些海西女真中的蒙古人后来编入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⑤] 再据东洋文库所藏另一件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有叶赫地方巴林氏绰贝的记载。天聪五年组编蒙古牛录时，让都统绰贝管理。他们属于镶白旗蒙古都统下右参领所属第九牛录。绰贝同族额尔济图的曾孙莎克都尔、绰克图、巴苏及巴苏的儿子辈和绰克图之孙辈几个人一直到乾隆初年也都居住在 nuktere ba，即游牧地或游牧处。[⑥]

笔者近期又发现更多相关的满文档案。如国家图书馆藏几十件蒙古八旗佐领印轴（temgetu bithe）和族长印轴。其中就有一件名为《镶红蒙古旗佐领萨尔柱承袭世管佐领印轴》。乾隆八年

① 《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东洋文库藏（下同），档案号：MA2–23–4–39。

② 《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档案号：MA2–23–4–41、MA2–23–4–45。

③ 《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档案号：MA2–23–4–46、MA2–23–4–47、MA2–23–4–52。

④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一，第 117 页。

⑤ 哈斯巴根：《清初海西女真诸部中的蒙古人》，《满学论丛》第 7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7 年。

⑥ 《镶白旗蒙古都统衙门档案》，档案号：MA2–23–4–3、MA2–23–4–4。

（1743）撰写而成的该档案交待了镶红旗蒙古都统二参领所属第五佐领萨尔柱牛录的各个氏族及其成员，同时也记述清楚了每一个成员的驻处。其中就有居住在游牧地（nuktere ba）的披甲和闲散等。他们原来都是女真哈达地方的巴林氏人户。①

结合以上的记载可以推测，叶赫、哈达等海西女真诸部中的蒙古人归附清朝编入蒙古八旗后，其部分人员依然居住在游牧地。那么，在此提到的游牧地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很可能是长城口外察哈尔八旗或其附近的游牧地。

入关后，顺治年间察哈尔八旗已经驻牧在大同、宣府边外。②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九年二月，“户部遵旨议覆，古北等口外空闲之地，分拨八旗。查喜峰口、独石口外既无闲地，正红旗又无赴边外领地之人，不必拨给。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旗、正黄旗。罗文峪 ③ 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 ④ 外地，拨与镶白旗、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旗、镶蓝旗。从之”。⑤ 冷口和罗文峪都是明代长城蓟镇重要关隘。冷口位于今河北省迁安市，罗文峪位于今河北省遵化市和承德市交界的地方。这些长城关隘从东往西分别是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等。清廷将这些口外土地分拨给八旗后当作庄田和牧厂。这些旗地与察哈尔八旗及其附近喀喇沁黄金家族所居游牧地等不能混谈。笔者的理解是，长城与察哈尔八旗及喀喇沁部人等所驻蒙古八旗游牧地之间有一些空闲地段，入关后将其分配给八旗各旗分。

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议覆档》中有一份雍正九年（1731）的档案，进一步说明当时口外依然有属于八旗王公和闲散宗室的各色人众。该满文档案一开始就通过雍正帝的上谕讲明了他想解决口外八旗王公所属贫困人丁生计问题的决心。“雍正九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八旗王公、闲散宗室等在口外看守牧群牲畜之蒙古等内，倘系有马畜田产者，尚能生计；无马畜产业者，伊之主子又可尽养乎？因不能尽养，妄加滋事时，即牵涉伊等无辜之主子矣。与其任此等人白白游荡，朕特派出大臣等，将此等人收管供养。”⑥ 因此，皇帝降旨调查口外这些人众的生活情况。该档案载：

> 今据宗人府查得来文内开，闲散宗室弘暄所买之马尼图地方蒙古男妇一百四十七口。宗室叶勒申、员外郎奉恩将军杜隆额并入在口外纳林乌苏苏尔会地方佐领之蒙古等十六口。员外郎富源所属牧群地方蒙古等九口。奉国将军鄂岳所属牧群地方蒙古等二户。此等人无马畜田产，伊等之主子不能赡养，情愿献出等语。镶黄满洲旗佐领哲勒津所属在张家口外喀布苏地方之蒙古等二口，笔帖式扎木苏所属在古北口外乌克尔赤劳地方之蒙古等七口。官学生江都所属在乌克尔赤劳地方之蒙古等十一口。原正黄满洲旗副都统永泰所属在阿尔思朗图地方之蒙古等十五口。公永谦所属在阿尔思朗图地方之蒙古等十五口。披甲伊昌阿所属在昆都仑库库尔吉地方之蒙古等二十四口。原公阿尔泰所属在昆都仑察罕诺尔地方之蒙古等十口。公噶尔萨所属昆都仑戈尔地方之蒙古等二十五口。前锋西图所属在昆都仑戈尔地方之蒙古等六口。参领于伟良所属在察罕额尔吉地方之蒙古等三口。侍卫路善所属在张家口外游牧地蒙古等五口。秀才博奎所属在张家口外游牧地之蒙古等四口。骑都尉班军所属在张家口外之蒙古等一口。原佐领雄寿所属在张家口外昆都仑地方之蒙古等六口。轻车都尉石林所属在张家口外昭赫地方之蒙古等六口。

---

① 《镶红蒙古旗佐领萨尔柱承袭世管佐领印轴》，国家图书馆藏，档案号：1219。相关研究参见拙文：《宗族组织与蒙古八旗牛录——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满文印轴为例》，《民族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② 达力扎布：《清初满蒙文档案记载中的八旗察哈尔》，《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 1 辑，2008 年。

③ 明代《九边图说》“图”标在遵化县旁“罗文谷营”，应该就是指罗文峪。参见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 12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9 页。

④ 参见《卢龙塞略》“图”，薄音湖、于默颖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 6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1 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32，康熙九年二月癸未。

⑥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议奏八旗王公等捐献其口外所属之蒙古等折》，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处满文议覆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以下略馆藏处），档案号：778-0003-0013。档案原文为满文，笔者汉译。

佐领巴尔品所属在察哈尔地方之五十九户一个佐领。原侍卫阿拉布坦所属在察哈尔之蒙古等二百十六口。正黄汉军旗都统耿化祚所属在阿古里地方之蒙古等一百余口。原镶红满洲旗护军和勒所属在岱干地方之蒙古等一口。正蓝满洲旗闲散宗室喜寿所属在多伦诺尔地方之蒙古等二口。闲散宗室兴让所属在黑风河地方之蒙古等四口。镶蓝满洲旗贝勒弘春所属在张家口外赛勒地方之蒙古等三十一口。和硕简亲王所属在口外察木罕地方佐领下之蒙古等六十九口。镶蓝蒙古旗佐领班第所属在岱干地方之蒙古等四口。镶黄旗包衣恰木保管领下领催色勒所属张家口外空郭尔地方之蒙古等十一口。内管领雅图所属在空郭尔地方之蒙古等二口。正黄旗包衣富森佐领下轻车都尉昌安所属在张家口外昂古里地方之蒙古四口。此等人无马畜田产，伊等之主不能养赡，情愿献出等语。[①]

这些献出的蒙古人口不仅仅是属闲散宗室或世职人员等，还有佐领、笔帖式、秀才、前锋等所属人口。可以认定，这些蒙古人口等都是私属性质的，没有被统计在八旗各旗官方比丁册、户口册之内。经调查，“宗人府、八旗查送前来之口外无业蒙古男妇，总计七百六十六口，另有蒙古等六十二户，有缮写人口数目者，或有惟缮写户籍数目者，伊等之主子亦不知其确数”。[②]

考察该文献形成的历史背景，从雍正至乾隆年间，清廷方面对八旗制度采取诸多措施，企图整顿其弊政。尤其是到此时八旗生计已经成为清廷一项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我们今天无法定位档案中出现的每一个地名的具体位置，只是可以确定一些地名大致的地理坐标。如“马尼图”，又名铁幡竿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热河图》上在独石口附近记有“马尼图岭”，应该就是指该地名。“昂古里”地名也在《热河图》上标有；[③]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昂古里”，即集宁海子，在正黄等四旗牧厂东六十里，土人名昂古里淖尔，又称为鸳鸯泺。“多伦诺尔”，即多伦泊，汉名七星潭，在御马厂东北，土人名多伦诺罗。“乌克尔赤劳”即乌克尔齐老，即独石泉，在镶黄等四旗牧厂东南五十里。[④] “张家口外昭赫”，可能是指“兆哈河”，在正黄旗察哈尔东南六十里。“岱干”，在镶红旗和镶蓝旗附近，很可能是岱干即黛哈池；史载“奄遏下水海”，在镶红旗察哈尔南四十里，蒙古名黛哈池。[⑤] 我们知道，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入京前后都住在代噶地方，就是该湖。“张家口外空郭尔”，可能是《口北三厅志》所记镶黄等四旗牧厂在张家口北一百里控果罗鄂博冈。[⑥]

以上提到的地方均处长城边外，这些闲散宗室等有私属性质的蒙古人户和察哈尔八旗人户杂居。他们主人从属的旗和佐领、管领不仅有镶蓝蒙古旗，还有镶黄、正黄、镶红、正蓝、镶蓝等满洲旗和正黄汉军旗，以及镶黄、正黄二旗包衣佐领、管领等。因此，雍正年间，在口外游牧地不仅有蒙古八旗所属人员驻牧，还有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所属人户。当然，从族属上讲这些人都是蒙古各部人。据档案所载，经当时的调查这些口外游牧地的人户“总计七百六十六口，另有蒙古等六十二户”。但是，将这些私属性质的人户献出后怎么处置？相关档案资料尚未发现。

此外，另一份乾隆二年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也交待京旗所属蒙古八旗更多人户的情况。据巡查游牧地的兵部员外郎、佐领兆明的奏折，他首先发现当时正黄蒙古都统下蒙古参领所属第九佐领和第三佐领[⑦] 的浩齐特、喀喇沁两部出身的蒙古人口在察哈尔八旗游牧地居住。据该档

---

①②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等议奏八旗王公等捐献其口外所属之蒙古等折》，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处满文议覆档》，档案号：778-0003-0013。

③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第 9 页。

④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 548。

⑤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 549。

⑥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 6，第 104 页。

⑦ 《八旗通志初集》卷 11 载，正黄蒙古旗都统蒙古参领第三佐领，原系第一佐领内人丁，康熙六年，苏朗管佐领时，分编一牛录。而第一佐领，原系喀喇沁地方蒙古，崇德九年以其人编为牛录。

载，“正黄蒙古旗德宁牛录[1]之浩齐特署理骁骑校扎木素、领催伊波格勒等呈称，该旗有15个浩齐特牛录，其领催、散丁共有140余名。先前若遇比丁之年将我等比丁入册，或有人进京当差为披甲和护军等，而迄今三十余年从未将我等登记在比丁册内，亦未曾招去进京担任披甲、护军”。“正黄蒙古旗常义牛录[2]喀喇沁捕盗兵西拉布、闲散巴雅思胡朗等呈称，我西拉布祖父为牛录章京色格勒堆，父亲为五级参赞策凌，我亲兄弟六，子四。此前我伯父明德管理佐领时，他本人率诸弟们进京当差为圣主献绵薄之力。”[3] 这些记载反映出，那些在口外居住被认定为正黄蒙古旗所属浩齐特、喀喇沁等部的蒙古人，或三十余年没有被统计在官册内，或有一些人可以进京服役。当时，在兆明的督促下全面考察居住在察哈尔八旗各旗的浩齐特、喀喇沁等部蒙古旗人，其结果如下：

在正黄旗察哈尔地方居住者有：除了马群之外，有浩齐特十三个牛录的闲散壮丁等百二十七名，其中，有业者四十一户，无业者九十七户，无业的独身（emteli）十一（户），总计四百七十九口。喀喇沁八个牛录的壮丁九十九名。其中，支领捕盗兵钱粮的披甲有六名，有业者十九户，无业者四十六户，无业的独身有十一（户），总计三百八口。

在镶黄察哈尔地方居住者有：喀齐尔（kakir）地方居住的蒙古旗和叶图等十三个牛录之喀喇沁人七百七十一户，二千二百七十一口，其中，捕盗兵有四十名，闲散壮丁五百一十一名。绥克（Suike）地方居住的明噶图等五个牛录的喀喇沁人七十八户，二百三十二口，其中捕盗兵十名，闲散壮丁五十五名。古尔板果尔地方居住者有班第等十个牛录之喀尔喀、察哈尔人二百一户，六百三口。其中，闲散壮丁等一百六十六名。附于在内满洲旗的安楚和登（ancu hoden）两个牛录之扎鲁特部人五十九户，一百九十九口。其中，闲散壮丁五十五名。查询他们原前来驻之因。委步军校伊苏堆等呈报，我们的祖辈们从盛京去京城，将其年长者居住在内蒙古人中，其余者被认为没有教养（tacin akū）迁至口外喀齐尔、古尔板果尔、绥克（kakir、kūrban gool、suike）等地方种地居住。其后，年老者、染病者、从护军休致者等陆续（从京城）来居住。

在正红察哈尔旗地方居住者有：浩齐特十一个牛录之有业者二十六户，无业者四十七户，共计二百八十四口。其中，捕盗兵八名，闲散壮丁九十九名。喀喇沁四个牛录之有业者两户，无业者六户，共计三十一口。其中，捕盗兵两名，闲散壮丁十二名。编入王公牧厂者浩齐特人八个牛录之有一二牲畜者十九户，无业者二十八户，二百七口。其中，牧丁五十九名，闲散壮丁八名。

在镶白察哈尔旗地方居住者有：在京蒙古八旗人和王公马群人等有十六个牛录之人，生活有着落者六十九户，勉强度日者六十五户，无业者一百九十一户，九百九口。其中，壮丁二百九十四名。雍和宫和王公牧厂十个牛录中生活有着落者九十九户，勉强度日者四十五户，贫困者五十六户，共计六百四十口。其中壮丁二百三十名。

在镶红察哈尔旗地方居住者有：浩齐特十二个牛录中有业者五十四户，无业者六十二户，四百二十六口。其中，闲散壮丁一百六十二名。喀喇沁六个牛录有业者十二户，无业者四户，四十九口。其中，壮丁十五名。王公、闲散宗室等牧厂的有业者二百二十三户，无业者二十一户，九百十四口。其中，壮丁二百七十一名。

在镶蓝察哈尔旗地方居住者有：浩齐特十五个牛录闲散壮丁二百二十八名。其中，有业者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1、《钦定八旗通志》卷18载，正黄旗蒙古都统蒙古参领第九佐领，原系察哈尔地方蒙古，于顺治元年编为牛录。其历代佐领为：巴图、博尔和兑、额尔几图、哈拉扣、广西、常寿、德宁、灵山等。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11载，正黄蒙古旗都统蒙古参领第三佐领，原系第一佐领内人丁，康熙六年，苏朗管佐领时，分编一佐领。而第一佐领，原系喀喇沁地方蒙古，崇德九年以其人编为牛录。

③ 《兆明奏察哈尔地方无业喀喇沁浩齐特人数并请交部料理折》，乾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具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3-0173-1052-001。档案原文为满文，笔者汉译，下同。

一百二十一名，无业者百七名。王公牧厂所属者壮丁百一十名。计其儿女等一千二百二十三口。喀喇沁三个牛录之有业者壮丁四十名，无业者壮丁十一名，包括其儿女共百五十七口。此外，浩齐特、喀喇沁的捕盗章京两名，包括其儿女七十三口。①

据兆明上奏，京城蒙古旗所属在察哈尔各旗游牧地居住的浩齐特、喀喇沁人数总计，壮丁2240余名，8960余口。其中王公、闲散宗室牧厂所属者有490户，共计2150余名。"这些浩齐特、喀喇沁人等均为从盛京跟随圣主之旧蒙古奴仆，向来笃信圣主洪恩，饲养牲畜，习惯在蒙古草地（monggo tala）生活。"②

据此次调查，在察哈尔八旗中，除了正白察哈尔旗和正蓝察哈尔旗地方没有浩齐特和喀喇沁等部人居住之外，其余6个旗都有喀喇沁人、浩齐特人等居住。接着，当年晚些时候，正蓝察哈尔旗总管英泰重新考察的结果是，该旗又有在京蒙古八旗所属10个喀喇沁牛录和7个王公牧群的喀喇沁牛录人众，其有业者547户，无业者60户。其中，无业者壮丁47名，年老和寡妇31名。"左翼四旗浩齐特、喀喇沁等部人，皆处在四旗游牧地之东南边六七百里末端处，山岭之下边喀齐尔、郭家屯（g'o giya tun）、伊玛图（imatu）、喇嘛营（lamun gašan）等地居住。有些人在各旗交错居住。"③

档案中出现的地名喀齐尔、古尔板果尔、绥克等，《口北三厅志》中有载：

（察哈尔镶黄旗）本旗坝内地方距张家口外十五里迤东自乌兰哈达起东北至独石外迤西阿尔撒兰达坝止，有山沟长一百三十九里。南至边墙北至达坝宽二三十里不等，有泉自山沟出，分为细流三处，蒙古呼为古尔板果尔（古尔板犹华言三道也）。西南流百余里至三道河会为一河。又自乌兰哈达南流入张家口，由古尔板果尔东偏至独石口东南有山沟，北界自乌鲁尔台达坝起南至黄土岭止长二百二十五里。又自黄土岭南三十里经边墙迤东至大西沟止广一百四十五里。自喀齐尔西界乌鲁尔台达坝东南六十里有山名黑龙山（土人呼为黑老山），势极高峻，林木茂密。自乌鲁尔台达坝有泉南流至三道店。又东南流四十里至四滩口，河归入白河，土人呼为黑河川，蒙古呼为绥克。以上皆坝内汉民、蒙古垦种田亩之地。④

由此可知，以上喀齐尔、古尔板果尔、绥克三个地方在口外张家口、独石口以北。理藩院题本载，于顺治十年将古尔板果尔地方给与镶黄蒙古旗。⑤ 而g'o giya tun，应该是《口北三厅志》之"口北三厅全图"所标郭家屯，地处围场以南。落在察哈尔八旗的东部边境线附近。

这些档案中提到的在京蒙古八旗所属蒙古人的部族和氏族所属分别是浩齐特、喀喇沁、扎鲁特、喀尔喀等。他们散居于除了正白旗察哈尔之外八旗察哈尔中的七个旗。虽然档案没有说明这些蒙古人具体从属于在京哪些旗分，但我们可以推测，这些蒙古人也分别属于正白蒙古旗之外的与察哈尔八旗各旗旗分相同的蒙古八旗各旗分或王公牧厂以及雍和宫等寺院。

据兆明上报，乾隆二年，京城蒙古旗所属在察哈尔各旗游牧地居住的浩齐特、喀喇沁人数，共计壮丁2240余名，8960余口。其中王公、闲散宗室牧厂所属者有490户，共计2150余名。然而，据《八旗通志初集》所记，当时蒙古八旗的牛录共计199个。此次考察到的在察哈尔八旗居住者涉及153个牛录，当然这并不是说153个牛录所属人员全部居住在口外游牧地。虽然如此，清代驻牧在口外的八旗蒙古人在整个蒙古八旗牛录数量中所占比例还是很高。

---

①② 《兆明奏察哈尔地方无业喀喇沁浩齐特人数并请交部料理折》，乾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52-001。

③ 《庄亲王等议恒德查议察哈尔无业蒙古人由》，乾隆二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52-002。

④ 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7，第110页。

⑤ 《署理理藩院尚书明安达礼等题议准古尔板果尔地方拨给镶黄蒙古旗使用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第1卷，第43-44页。

我们知道蒙古八旗牛录的一半左右是由喀喇沁人组成，所以说在口外察哈尔八旗游牧地居住者中喀喇沁人居多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其中有如此众多的浩齐特人还是不可理解。因为蒙古八旗的牛录当中惟一清楚记载的是，正蓝旗右参领所属第九牛录是由浩齐特和喀喇沁人共同编成的。其他浩齐特人的踪影，两部《八旗通志》都没有明确记载。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此次考察统计的在察哈尔各旗居住的浩齐特人或许当初都是被当成察哈尔部人统计在内的。因为原来浩齐特是察哈尔部的组成部分，其属鄂托克。另外，八旗满洲旗分所属部分蒙古部众也有可能在口外驻牧。

我们观察到，对处置这些喀喇沁、浩齐特人之事一直持续到乾隆十五年。当年，兆明提议："查得，浩齐特、喀喇沁人均驻在察哈尔游牧地，有些旗位于山岭之内，但山岭之内地为察哈尔南部游牧地，与新旧察哈尔佐领游牧地相距不远。然而八旗巴尔虎、厄鲁特等佐领游牧地位于众察哈尔佐领游牧地之北边，距浩齐特、喀喇沁人游牧地稍远，因此不便把浩齐特、喀喇沁人编入巴尔虎、厄鲁特佐领。若将他们平均编入察哈尔新旧各佐领，可掌管这些人。"[①] 他的建议是将这些浩齐特、喀喇沁等人平均编入察哈尔各佐领。但是，最后怎样处置这些浩齐特、喀喇沁人，资料没有显示。[②]

那么，这些在察哈尔八旗及其相邻地区居住的喀喇沁和浩齐特等部众为什么长期没有被登记在比丁册等官方数据和《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上？他们又在什么时间被编入八旗和驻牧在口外？如前所述，乾隆二年兆明等调查到的实际情况是，正黄察哈尔旗所报："浩齐特、喀喇沁部众原来如何居住在我们察哈尔旗之事无案可查。"但据该旗有些人反映："我们浩齐特人众从盛京跟随圣主来后，组建牛录编入在京蒙古旗。而令其余闲散人众居住在游牧地。"查询镶黄察哈尔地方居住的喀喇沁、扎鲁特部众前来驻牧之由，档案载："委步军校伊苏堆等呈报，我们的祖辈们从盛京去京城，将其年长者居住在京蒙古中，其余者被认为没有教养（tacin akū）迁至口外喀齐尔、古尔板果尔、绥克（kakir、kūrban gool、suike）等地方种地居住。其后，年老者、患病者、从护军甲兵休致者等陆续（从京城）来居住。"可见有些喀喇沁、浩齐特等人众的来源还是可以查到的。而正黄蒙古旗德宁佐领的情况是："迄今三十余年未曾将我等比丁入册。"[③] 这种情况是较为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正黄蒙古旗，其他察哈尔各旗也是从 18 世纪初年开始没有把口外游牧的喀喇沁、浩齐特等部众统计在官方的档册之内。所以，雍正至乾隆年间所撰的《八旗通志》等八旗志书中，我们也见不到他们游牧地的相关记载。

雍正十年，察哈尔八旗共有 100 个牛录，有厄鲁特、巴尔虎、科尔沁、喀尔喀等蒙古各部出身，而其中并没有提到喀喇沁牛录。[④] 乾隆年间察哈尔八旗牛录数目增至 120 个（不计西迁察哈尔 17 牛录）。据嘉庆朝《大清会典》，其统计的牛录中有察哈尔牛录 62，科尔沁牛录 7，乌喇特牛录 3，茂明安牛录 4，苏尼特牛录 1，伊苏特牛录 1，喀尔喀牛录 3，巴尔虎牛录 15，额鲁特牛录 18，新额鲁特牛录 6，不计西迁新疆的察哈尔，共有 120 个。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

---

① 《镶红旗总管讷清额奏将浩齐特、喀喇沁人等一体编审人丁并请入察哈尔佐领管辖折》，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87-007。

② 苏日朦撰文认为，乾隆十五年将这些浩齐特、喀喇沁的无业人员全部编入察哈尔八旗各牛录。但是，笔者从其所引相关档案内容中没有发现清朝决策者同意将这些人口编入察哈尔八旗的依据。参见苏日朦：《乾隆年间八旗蒙古喀喇沁、浩齐特佐领编入察哈尔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③ 《兆明奏察哈尔地方无业喀喇沁浩齐特人数并请交部料理折》，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3-1052-001。

④ 《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整编察哈尔八旗佐领折》，雍正十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73-1026-006。

载，察哈尔八旗一共有121个牛录，[①] 其中也没有记述喀喇沁牛录之事。可见，设置察哈尔都统[②]以后直至晚清由清廷中枢机构所组织编纂的《会典》等文献也没有把以上提到的喀喇沁、浩齐特等人众编入察哈尔八旗相关的记载。

进一步考察后，笔者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组清末汉文地图，名为“察哈尔八旗地图”[③]，该组地图一函九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清末察哈尔八旗各佐领之地望等信息，史料价值极高。其中一幅是“察哈尔正红旗”图，内有地名“喀尔钦和奇特牛录”，笔者以为这里的“喀尔钦和奇特”是“喀喇沁、浩齐特”的另一种音译。[④] 这表明至清末喀喇沁、浩齐特等部众已经被编入察哈尔八旗各牛录。另外，近当代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也显示，20世纪以后或有整牛录的喀喇沁人，或部分喀喇沁人已经编入察哈尔各旗佐了。[⑤]

三、结语

回顾学术史，在八旗研究中蒙古八旗的研究明显滞后于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究其原因，学界对新的档案史料的重视和挖掘不够是关键因素。近几年，笔者努力查阅日本的东洋文库和国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保存的相关档案文献，藉此推动蒙古八旗的研究。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满文档案探讨蒙古八旗在口外游牧地的问题，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第一，除了部分喀喇沁博尔济吉特氏黄金家族的诺颜、台吉们清初已经迁徙到外喀尔喀车臣汗部之外，喀喇沁黄金家族及部分乌梁海塔布囊们归附后金后先编入满洲八旗，天聪九年设蒙古八旗时又转入蒙古八旗。当时，这些喀喇沁人和部分乌梁海人驻牧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多伦县及其附近的游牧地（nuktere ba）。但是，直到晚清这些人和察哈尔八旗没有统属关系，只是到清末后他们逐渐被编入相应的察哈尔八旗牛录。这就是所谓的行政区域上的从“属人主义”到“属地主义”的转变。

第二，口外居住在游牧地的蒙古旗人，不只是喀喇沁黄金家族和乌梁海塔布囊们，还包括从海西女真诸部来归的巴林等部蒙古人。我们见到的有限史料显示，从清初到晚清，蒙古八旗各旗佐领所属喀喇沁、浩齐特、扎鲁特等部蒙古人丁一直驻牧在口外游牧地。另外一些属于满洲旗、汉军旗以及牧群、王公等的人丁也长期驻牧在口外游牧地，其人数也比较可观。

第三，八旗构成的基本单位和组织是牛录，而构成蒙古八旗的每一个牛录，其成员并一定全部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不管是京城，还是游牧地或其他驻防点，同一个牛录内的人员常驻防在不同的地方。在京蒙古八旗和游牧地蒙古八旗之间，人员是可以互相流动的。

References

Anami Korehiro. “The Founding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Mongolia in the 9th Year of Tiancong” . *On Military Histor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iayangshuju, 1980.

Darijab. “Mingdai monan menggu lishi yanjiu” (A Study of Monan Mongolian History in Ming Dynasty), Hohhot: Neimenggu wenhua chubanshe, 1998.

Darijab. “Qingchu manmengwen dangan jizaizhongde baqi chahaer” (Eight Banner Chahar in Manchu and Mongolian Archive Record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ongguo bianjiang minzu yanjiu (*Studies of Chinese Frontier

---

① 相关研究见达力扎布：《清代八旗察哈尔考》，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②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丑。

③ 索书号：2194。

④ 哈斯巴根：《“察哈尔八旗地图”初步研究》，待刊。

⑤ 后藤十三雄：《蒙古游牧社会》，布林译，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室印刷，1992年，第40页；正蓝旗民协副主席、口传史分会主席特古斯巴雅尔于2018年7月在内蒙古正蓝旗的采访记录。在此向提供调研材料的特古斯巴雅尔先生表示谢意！

Nationalities) 1 (2008).

Darijab. “Qingdai baqi chahaer kao” (A Study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ahar). *Mingqing menggu shi lungao* (Mongol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2003.

Ding Yizhuang. *Dingdai baqi zhufang yanjiu* (Research on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in the Qing Dynasty). Shenyang: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03.

Goto Tomio. *Menggu youmu shehui*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Translated by Burin. Hohhot: Neimenggu zizhiqu menguzu jingjishi yanjiushi, 1987.

Guo Chengkang. “Qingchu menggu baqi kaoshi” (Explan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of Mongoli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inzu yanjiu* (Ethnic Studies) 3 (1986).

Hasbagan. “Zongzu zuzhi yu menggu baqi niulu: yi guojia tushuguancang qingdai manwen Yinzhou weili” (Clan Organizations and the Eight Banners of Mongolia -- A Case Study of Manchu Scrolls from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Minzu yanjiu* (Ethnic Studies) 4 (2019).

Hasbagana. “Mongols in Hercynian Jurchen tribes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Manxue luncong* (Essays on Manchuria) 7 (2017).

Liu Xiaomeng. *Qingdai Beijing qiren shehui* (Beijing Banner Man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2008.

Oyunbilig. *Kharachin Wanhu yanyanjiu* (A Study of Kharasin Wanhu).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2005.

Oyunbilig. “Sanshi dalai lama yuanjidi zhi diwang” (The site of the death of the third Dalai Lama). *Wusesifan: Duoyu wenbenzhongde neiya minzu shidi yanjiu* (Five Colors and Four Fathers: A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y of Inner Asian Nationalities in Multilingual Texts). Shanghai guji chbuanshe, 2016.

Umeyama Naoya. “The Founding of Eight Banners Mongolia and the Domin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o Mongolia: A Case Study of the Kharachin Mongols.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48, 2006.

A Study of the Nomadic Habitations outside the Great Wall of the Eight Ba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N. Hasbaga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sbgn@126. com)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the Qing Mongol Eight Banners’ habitation is only vaguely described in officially composed documents like *Eight Banners’ General Records* (first edition), *Eight Banners’ General Records* (second edition) and other related sources of the eight banners. Recently, we observed from the archives in Manchu, Mongolian and Chinese, kept by The Toyo Bunku in Japa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hat a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Mongol Eight Banners were nomads who were stationed in Mongolian grasslands outside the Great Wall. At first, the Kharachin golden family and some Uryangkhai nobilities and their subjects were in affiliation with the Manchu Eight Banners until they were transferred to Mongol Eight Banners in the ninth year of Tiancong when Manchu Court newly established the Mongol Eight Banners. At that time, Mongolians still lived in their old nomadic territory, which is now in Zhenlan Banner and Duolun County of Inner Mongoli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late Qing, many Mongolians from the Mongol Eight Banners, consisting of multiple tribes like Kharachin, Khuuchit, and Jarut, had been living outside the Great Wall. In addition, some men and households belonging to the Manchu Eight Banner, Chinese Eight Banners, Herding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inces, etc. had also been living outside the Great Wall for a long time. All these facts make for a conclusion that the people of Beijing eight banners and grassland eight banners were to certain extent able to flow to each other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Mongol Eight Banners, nomadic habitation, Chakhar